

【教育学研究】

# 大学与社会需求关系的历史演变及当代转型

刘芳

(淮阴师范学院,江苏淮安 223001)

**摘要:**大学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又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地演进和发展。新时期由于社会需求的量大、多样和快速变化,导致了社会需求与大学反应之间新的不平衡。从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可以发现,大学与社会需求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不即不离的桥梁型”、“零距离的渗透型”和“亲密无间的融合型”三种模式。当下崭露头角的“亲密无间的融合型”模式呈现出丰富的“多态现象”,显示出了一定的生命力和活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学;社会需求;研究型大学;社会服务型大学;创业型大学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3)05-0092-05

## 一、应运而生与临机应变:大学是社会需求的产物

历史上,作为真正独立形态的高等教育机构,欧洲中世纪大学是现代大学的历史起源和创建基础。从中世纪大学的产生和办学模式可以看出,它“主要是培养人才的职业学校,只是在有限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为学习本身的概念而存在的。大学在满足专业、教会和政府对各种人才的需要过程中不断发展”<sup>[1]</sup>。中世纪大学主要是通过教学的形式传播人类文明知识,实施的是一种特殊的专业教育:培养官吏、牧师、律师和医生。最早形成于11、12世纪的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和波隆那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在进行神学教育的同时,都是以专业教育闻名,萨莱诺大学以医学闻名,波隆那大学以法律闻名,巴黎大学以神学闻名。17世纪从欧洲去北美洲的清教徒建立的美国早期大学也只有两个目的:培养神职人员和公职人员。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则是科举制度的附属物,在“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观念下,完全为培养封建官吏服务。

人类知识经过漫长的累积之后,文艺复兴时发生了分化。之前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教育由教会势力一统天下,哲学、政治、法学等意识形态的一切形式都包含在神学范畴内,关于自然和人体的科学受到了教会的全面禁锢。文艺复兴运动高扬人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关于社会、自然、人自身的学科和知识蓬勃发展。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则加速了知识分化进程,引发了欧洲学术界关于自然科学知识地位的反思和纷争。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形成了以纽曼、阿诺德为代表的坚持义理价值观的自由教育派,以及由赫胥黎、斯宾塞为代表的坚持功利价值观的科学教育派,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抗衡和争论,最终自然科学教育在传统大学里占有了一席之地,在新建的大学里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由于人类知识的累积、发展和演化以及工业革命的刺激,大学开始形成了学科、专业和课程等制度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对教育的强烈需求。在这种社会需求的驱使下,19世纪初,在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洪堡以“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办学思路和原则创建了柏林大学,从而使科学研究迈入大学讲堂。

由于部分传统大学对工业革命产生的科学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要求并未完全作出有效的、积极的回应,已赶不上时代的步伐,于是在英国一场“新大学运动”悄然兴起,一批面向工业化建设的新兴学院相继建立。这些

收稿日期:2013-07-23

作者简介:刘芳(1976-),女,江苏泗阳人,助理研究员,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新大学虽然没有学位授予权,但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密切,重视职业技术教育。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又迎来了电气时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发明层出不穷,如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建立等。这些新技术和新发明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迎来了高等教育的革命。在美国,1862年颁布的《莫雷尔法案》迎合了这场革命,政府赠予各州土地用来办大学,并规定这种“赠地大学”必须以“为各州农业和工业发展服务”为宗旨,提出了“大学要忠实地为社会需求服务”。至此,除教学和科研以外,“为社会服务”成为高等教育的第三大职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的活动范围已从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到传播知识、发展知识再到传播知识、发展知识和运用知识的结合,大学的功能也经历了从教学到教学、科研结合再到教学、科研和服务的统的历史演进。大学的活动范围和功能的拓展说明大学在逐渐由单一走向多元、封闭走向开放。大学是社会需求的产物,两者在不断地相互交融与抗衡中彼此适应、相互满足,实现了互动和双赢。

## 二、需求和反应不平衡:当今大学与社会需求的新特点

由于大学活动范围和功能的不断扩展,同时也由于大学拥有独特的资源,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作为社会“动力源”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人们对大学越来越关注,对大学的社会需求也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具有多样性和不协调性。在这种形势下,伯顿·克拉克认为,现如今来自各个方面的逃避不了的需求的洪流,雨水般地降落在高等教育系统:更多的不同类型的学生,寻求入学机会,从精英到大众化的无穷无尽的“顾客”对大学造成了无穷无尽的需求;更多的劳动力部门需要受过高度专门化职业训练的大学毕业生,不同层次的学生指望得到各种专业资格,大学毕业生也需要对他们的专业生涯进行再训练,因而劳动力的培训要求事实上也变得无穷无尽;旧时的和新的赞助人对大学教育寄予更大期望,政府指望大学做更多的工作而减低生均开支,其他赞助人特别是工业界多种多样的期望非常迫切,赞助渐渐变成利益集团表达它们无穷无尽意见和需求的大合唱;最为重要的是知识超过资源,没有一所大学,没有一个国家的大学系统能够控制知识的增长,知识的扩展已成为“无穷尽的边疆”。这些无穷无尽的需求的宽阔的潮流联合起来对大学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超负荷”<sup>[2]</sup>。

目前,社会对大学的需求不但是超负荷的,而且是不确定的,是快速变动不居的。从人类历史来看,社会变化的节奏越来越快,以往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变革,如今只要几年就足够了。在以前,未来是确定的,未来就是过去的重复,我们可以根据现在去规划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是30年、40年。而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全新的21世纪,我们的时间视野越来越短,也许只能规划将来的5年、3年,甚至更短。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确定,唯一不变的是变化。高校内外部环境的多元和多变发展进一步增加了高校满足社会需求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大学应改变过去的求平求稳,力争求变求新,以变应变。在知识经济的“十倍速时代”,不但要正确地做事,更要做正确的事。现代大学不但应该为变化无穷的现代社会服务,还应该为我们不可预知和无法想象的未来社会服务。

正是由于当今社会需求的超负荷和快速变化,目前,大学的反应速度明显迟钝,被动地适应社会需求和逐渐增加的社会压力使大学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人们甚至开始对大学存在的合法性产生质疑。除了外在的压力导致社会需求与大学的反应不平衡外,还有其内在的阻力。正如阿什比所说,在社会环境力量迫使高等教育体系改变时,很可能遇到两种遗传的阻力,第一种阻力是这种体系存在着反对任何改革的习惯势力,第二种阻力是更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大学工作者所深信的教育目标,这些传统的力量又构成了高等教育体系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犹如基因对生物体的作用,它要保持高等教育体系的特性<sup>[3]</sup>。因而,大学始终徘徊在外在压力与内部阻力之间,但往往是屈服于内在的阻力。

大学更加强调的是内部一致性,强调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强调理性民主、客观公正和知识的创新发展,更看重的是社会长远的和最根本的需求,要求大学能一以贯之地坚守着它们的核心价值和理念。而事实上“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大学理念。大学作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她的理念必须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她的社会功能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sup>[4]</sup>。更何况当今文明社会的现实需求与大学“所深信的教育目标”以及社会长远的、最根本的需求在更多情况下目标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对立的。所以,为

了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对一般大众利益负有责任的公共机构,将不能再免于‘他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的辩护责任了。大学也不会再将大众的批评搁置一旁,仅视为肤浅的心智表现。相反的,大学将渐增地必须为自己解释,为自己的重要特性辩护,并举实例证明自己的服务是有所值的。它将使其为数众多的校内外人士,更加了解它的服务范围与表现的效能(也就是绩效责任)”<sup>[9]</sup>。大学必须要对包括政府、劳动力和学生在内的资助和支持大学的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的即时的、短期的、多样的甚至是矛盾的期望和要求作出快速的反应。

### 三、大学的转型:大学与社会需求的关系模式

正是由于当今大学社会需求的这些固有的矛盾和新的特点,大学满足社会需求的方式和途径已经并且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正如康乃尔大学校长罗德德所说,公共服务,主要是通过教学方式来实现的,它是早期大学创建的原因,目前它仍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技术转让方式,不断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但是在21世纪初期,大学公共服务的范围扩展到超越教学及授予学位这样一种影响人生每一步的方式。事实上,21世纪的大学是涉及到公众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机构,致力于满足每一社会需求<sup>[9]</sup>。

在纽曼倡导的“理想大学”因完全脱离社会而被时代淘汰后,弗莱克斯纳提出了“现代大学”,并强调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是学者和科学家们应该关心的四件大事。大学必须在以科学的态度研究自然现象与客观世界的同时,采取一种“客观立场”,避免参与立法机关、社区公众、市政当局和各种商会的实际事务。弗莱克斯纳为我们归纳了一个大学服务社会需求的经典范式——“巴斯德式的服务”。巴斯德是著名的法国化学家。当蚕病、生产葡萄酒与啤酒的困难、鸡瘟和狂犬病等等威胁着法兰西时,巴斯德为了解决这些迫在眉睫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将研究的重点由基础理论转向实际应用。他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与建议,最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这种服务范式就是“不即不离的桥梁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学不是直接发生社会服务,而主要是通过教学和科研这一中介环节来满足社会需求。服务社会是教学和科研的合理延伸,并且强调服务的学术性、科学性和适度性。这种模式主导下的大学往往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学术共同体”的特点,通过保持教学、科研活动的质量,在知识的保存、传播和创造中满足社会需求,为社会服务。大学只是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不是主动提供服务。

二战后,大学内部以及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克拉克·克尔发现大学已不再是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单一群体,而是逐步形成了一个由若干个社群组成的都市化的“多元化巨型大学”。他甚至断言,弗莱克斯纳所说的“目的的高尚和明确,精神和目标统一”的“现代大学”正濒临灭绝<sup>[7]</sup>。历史学家洛温博士比较深刻地描述了这种变化,如果说二战前的大学是学者和科学家的共同体,那么,战后的大学已演变成“工商业巨头”和“学问巨头”所管理的“法人实体”<sup>[8]</sup>。大学已从社会的边缘逐步走向了社会的中心,成为持续维持社会运转的“动力源”。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从不即不离过渡到了零距离,大学与社会需求之间已更多地呈现的是一种“零距离的渗透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教学和科研演变成了服务社会的目的本身而不再是服务社会的手段,但这种渗透还是谨慎的和有限的。

密西根大学校长杜德斯达在阐述21世纪大学的社会服务时指出:“在我们步入知识时代之时,大学传统的三项任务——教学、科研和服务——可能已经太过狭隘了,我们需要思考更多的现代形式以完成我们的创造、保留、融合、传播和应用知识的基本任务。”<sup>[9]</sup>早在20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1995)》中指出:现在需要用一种新的观点来看待高等教育,这种观点要求把大学教育的普遍性与更多适切的必要性结合起来,以对社会对其功能发挥的期望作出回应。该组织还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1998)》中重新展望高等教育时,也提出了具有适切性的长远目标:高等教育的适切性,应以高等院校的作为是否符合社会的期望来衡量。所有这些都表明大学与社会及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紧密,大学与社会之间不但是零距离的渗透而是呈现出犬牙交错的亲密无间的有机整体。大学与产业界及社会之间明显的线性划界日益模糊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网状的重叠与融合<sup>[10]</sup>。很明显,谨慎、有限的“渗透型”模式已不能完全反映和概括这些新情况,而实际上一种新的“亲密无间的融合型”模式已在大学生态中悄然出现。

从宏观和总体上把大学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分为“不即不离的桥梁型”、“零距离的渗透型”和“亲密无间的融合型”三种模式,主要是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由疏到亲的程度来划分的,桥梁型表现为“你是你,我是我”,渗透

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型则是“难分你我”。从历史时序来看,它们是沿着从古到今再到未来的历史脉络发展形成的,但它们目前又同时并存着。这三种模型只是对大学与社会需求关系现实的、大致的、宏观的描述,它们既是不同时期大学与社会需求关系的一种历史发展过程,也是现实状况的一种多样性存在的描述。总体而言,后一种模式往往包含前一种模式,每一种新模式的出现都是对先前模式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全部的替代。

大学向“亲密无间的融合型”的过渡与转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具有深层次的原因。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根据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收支上的变化,以翔实的数据为基础,用资源依赖理论解释了大学组织行为的这种变化。资源依赖理论提出,随着高等教育中政府的非限制性公共经费的压缩,国家体制中的院校将改变寻求资源的模式以争取新的、更加取决于竞争的经费。为了对新的机会作出回应,院校将不得不从基础研究转向更为应用性的科学技术研究。此外,他们可能会提高学费,而且在降低劳动成本的同时更加积极地扩大销售和服务。再由于二战后“政策和法规将一种把公共利益限定为由保护公共实体不参与商业活动来达到最优服务的思想,转向一种把公共利益看成由公共组织参与商业活动来达到最优化服务的思想”(Slaughter&Rhoades 1993),上述四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来自政府的经费份额,特别是关键的固定拨款减少了,并由此引起了大学里工作性质上的改变。收入模式上的这些变化推动了学术资本主义,因为它们把教学科研人员和院校推向补偿固定拨款份额损失的市场及市场行为中”<sup>[11]</sup>。虽然资源依赖理论是基于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分析,但在办学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上,各种类型的大学是具有相通性和一致性的,所以,这一理论是有一定的普适性的。

#### 四、殊途同归:大学与社会需求关系新模式的“多态现象”

“亲密无间的融合型”模式作为大学与社会需求关系的一种新模式,整体上这一模式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但在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校中呈现的途径、方式和程度上又具有鲜明的差异性,出现了类似于生物进化过程中的“多态现象”(Polymorphism),即指同一物种在同一生态环境中存在着两个或两个以上明显区别的类型。恰恰是这种“多态现象”充分体现了这一模式的多样化和丰富性。

20世纪最后的30年,被全世界称为“精英大学楷模”的哈佛大学发生了“世俗化”的转变,哈佛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哈佛对人种和性别的追求也开始多样化,科学家日渐频繁地涉足商业投资,学生和教师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热情日益高涨,官僚作风日盛、基金收入不断增加和自大情绪日益滋长——哈佛在为世界服务<sup>[12]</sup>。哈佛从精英化大学转向越发“世俗化”的大学。理查德·诺顿·史密斯则在《哈佛世纪:锻造一所国家大学》一书中把哈佛置于国家的背景之下,深入描述和探讨了哈佛逐步转化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阐明了哈佛的辉煌不仅是因为它的学识,更重要的是它的服务精神。

而同是私立研究型大学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则创建了另一种模式——“创业型大学”,即将基础研究和教学与产业创新相结合。它主要“在大学将教学和科研与知识资本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通过产出社会资本、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大学加大了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sup>[13]</sup>,从而正在成为继哈佛之后的学术界的新榜样。这主要是因为MIT展示了一种以创新的对比模式为基础的创造性学术研究综合体。“研究型大学和赠地大学分别展示的是一种从学术研究到实际应用的线形创新模式,和另外一种反向的线形创新模式。MIT结合了这两种模型,正向的和反向的,沿着非线形的交互创新模式在发展”<sup>[13]7</sup>。

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作为公立研究型大学的代表又展现了另一种形态——“社会服务”型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R·伯达尔(R. Berdahl)在1998年北京百年校庆上以《一个美国经验——社会服务中的研究型大学》为题发表了演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该校的基本办学经验总结为“社会服务”<sup>[14]</sup>。当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学服务社会的重点是不同的。在19世纪中期,学校的主要服务内容是发展农业、推广技术和普及中等教育;到了20世纪中期,服务重心向军事和国防转移,以满足战争的需要;二战后,核能的和平利用和民用工业的研发又成为学校的研究重点。21世纪,伯达尔认为“社会服务”依然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办学目标,而其重点将转移到备受世人关注的人类生存环境和健康上。

透过历史的视域、理论的剖析以及现实的考察,我们发现,“亲密无间的融合型”模式已经崭露头角,并通过

其自身的多样化和丰富性显现出了一定的生命力和活力。但作为新生事物的这一模式也存在着需要进一步解决的老问题,那就是大学的商业化、市场化与大学的核心价值的矛盾,大学目标的多样化、无序性与大学的内在逻辑的矛盾。所以,为了避免大学“在其自身企业本能的重压下产生内爆”(Gould, E. 2003),大学必须对如此庞大的服务对象的多样的和不协调的价值观、需求和期望排出优先顺序,必须保持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因素之间的适当平衡。因而,面向未来,大学能否取得广泛支持,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将这些不同群体的要求与价值观和平相处,而不是水火不容。

#### 参考文献:

- [1]伯顿·克拉克. 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9.
- [2]伯顿·克拉克. 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58-159.
- [3]阿什比.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139.
- [4]任彦申. 从清华园到未名湖[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21.
- [5]阿尔巴赫,伯巴尔,冈普奥特. 21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2.
- [6]罗德斯. 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24.
- [7]克拉克·克尔. 大学之用[M]. 第五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7.
- [8]洛 温. 创建冷战大学:斯坦福大学的转型[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
- [9]詹姆斯·杜德斯达. 21世纪的大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0]亨利·埃兹科维茨,劳伊特·雷德斯多夫. 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4.
- [11]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 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2.
- [12]莫顿·凯勒,菲利斯·凯勒. 哈佛走向现代化:美国大学的崛起[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前言.
- [13]亨利·埃兹科维茨. 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 [14]R·伯尔达. 一个美国经验——社会服务中的研究型大学[C]//21世纪的大学——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召开的高等教育论坛论文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13-116.

##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ocial Needs

Liu Fang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001, China)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is a product of social needs and is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developing with the changes of social needs. The large demand, diversit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needs in the new era lead to a new imbalance between social needs and the response of university.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alisti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nd social needs experienced the three patterns: “Bridge-nor too close nor too distant”, “Penetration-zero distance” and “Fusion intimacy”. Now, the pattern of “Fusion intimacy” makes its mark and presents the rich of “polymorphism” and shows vitality and vigor.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social needs; research university; the social service oriented university;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责任编辑 石丽娟)